

习近平家语

我去当地委书记，宁德地委宾馆只有两个房间有窗式空调，让我住一间。我住了一个月，赶紧走，不能搞特殊化。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我在福州的家里才安了第一台窗式空调。不是我买不起，一个是电容量不够，装了以后老烧保险

丝，都在居民区，我不能带这个头。再一个，大家都没有安，我也就没安。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11日)

家视界

有一种爱叫“粘小”

——中老年父母过度依赖子女现象观察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小凡正开会，微信发出震动，又是来自老妈的问候——“我想看看你，好吗”，小凡无奈地将手机扣在桌子上，十秒钟后，她忍住烦躁的情绪，回复了一句“我在开会，晚些……”

“这样的微信，我妈几乎每天都会发来，我真是又厌烦又同情又无奈，我已经成人了，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呀。”小凡皱着眉头说。

如今，像小凡母亲这样“粘小”的父母不在少数。这些中老年人在离开工作岗位后，生活圈子越来越窄，对子女的情感依赖也就越来越强烈，他们把子女当作唯一的依靠，对子女的百般关心和牵挂成为生活的重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会对自己和子女产生怎样的影响？应如何调整退休后的生活？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是关心惦记，还是情感绑架？

来自山东枣庄的小凡26岁，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同时也把妈妈的心带到了北京。说起妈妈，小凡欲哭无泪，“每次视频我都是强忍着听妈妈唠叨，吃饭了没？吃什么呀？让我看看呗？今天冷不冷？让我看看你穿的什么衣服？周末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家呀？……她恨不得一天24小时监视我，这种爱真的太沉重了，我感觉特别压抑。”

曾有几次，小凡因无法忍受和妈妈发了脾气，可妈妈表现出来的伤心和痛苦，又让小凡很可怜妈妈。“我妈就我一个孩子，辛辛苦苦供我上学，确实不容易，发完脾气我又会感觉内疚和自责。”

小凡说，知道妈妈是惦记着自己，但这样感觉很累，很压抑。“真心希望妈妈能够多一些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关心我。”

记者在知乎上搜索相关话题，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相似的情况——

“我最害怕我妈发来死三连环——‘在吗？你在干嘛？怎么不理我？’妈妈非常粘我，我从这份粘人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压力不是爱。”

“只要看到我周末不是在加班，而是和朋友们出去玩，我妈就会很生气，说我不去陪她，开始教训我。”

“我妈喜欢翻我的东西，发现我办了一张信用卡，就持生气，说我什么事情都瞒着她，说我不贴心。我有时候想换个城市生活，但我妈说不管我到哪里，都会跟着我。”

“我妈超级喜欢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我事情多脾气不太好，她就生气，还得让我去哄她，她总说供我上学花了这么多钱我不知道感恩，弄得我很内疚，感觉这是情感绑架。”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婷观察，这种“老粘小”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子女保持较高频率的联系，比如每天都要微信视频或者电话，随时随地想掌握子女的动向。二，高度干涉子女的恋爱交友或者工作选择。三，对子女进行情感绑架，如果子女的行为没有顺从自己的心意，就会很不愉快。看着一个个委屈又无奈的表达，我们不禁要问，这届家长怎么了？

是老人的错，还是背后另有原因？

“板子不能简单地打在老人身上，这种现象背后存在多重的深层原因。”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计迎春对此表示。

近年来，计迎春一直在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家庭模式和代际关系的变化，她分析认为，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从等级制、一言堂的大家庭，变成了代际之间互相依赖的小家庭，而像“老粘小”“啃老”等现象实际上都是代际互相



中老年父母对子女的百般关心和牵挂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

依赖的一种表现，只是每个家庭的程度有所不同，“虽然互相依赖的极端现象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比起上一代人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老人对子女的依赖是与控制并存的。”

据计迎春观察，对于子女依赖和控制程度较为严重的是中老年群体，身体和精神尚好，处在有能力和精力“粘小”的生命阶段。且多出现在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家庭。

“多重深层原因”指的是哪些方面？计迎春认为，首先是结构制度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个人工作角度来讲，从类似大家庭的单位体制——比如提供铁饭碗和完善的福利待遇，转变为完全市场化的雇佣体制，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再生产负担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小家庭中，这就需要家庭成员之间抱团取暖、互相帮助，其中既包括经济上的支持，也包括精神上、情感上的依赖。

“独生子女政策正是与这个进程同步的。”计迎春强调，一个家庭只育有一个子女，少子化促进了密集母职的盛行，父母在物质上、时间上、情感上对子女予以密集投入，那么相应地他们对子女的期待和依赖就会增大。而极端的依赖，就形成了“老粘小”现象。

另外，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模式，比如数字化设备和技术的应用，计迎春提出，不能很好地掌握这些技能的中老年人会感到无助和不便，更会增加对子女的依赖。

“这些原因是中国这个转型社会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浓缩，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老粘小’‘啃老’等社会现象恰恰就是当下相互依赖代际关系的一体两面的集中体现。”计迎春总结说。

李婷表示，从个体层面上看，中老年人在离开工作岗位后，正处于人生的重要转变阶段，社会关系的急剧收缩需要他们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找到新生活的意义。而一些无法很好调试自己的老人便会加重对子女的依赖。

如何避免父母的过度“关爱”？

父母对子女的过度依赖和控制，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子女造成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道德上的绑架，更不利于子女的生活和家庭的和谐。

李婷分析，“老粘小”可能会破坏自己与子女的关系，使得子女产生逆反心理，增加亲子之间爆发矛盾的可能。老人对子女恋爱和工作的过度干预，会破坏子

女成长的社会化过程，降低子女找到合适伴侣和工作的机会；老人对子女工作生活的过度关心与包办，还会产生诸如“啃老族”与“妈宝”等无法很好适应社会的青年群体。

“受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影响，很多父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子女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人格的认可、理解和尊重是不够的。”计迎春表示，当发现代际之间出现矛盾时，有的家庭可能通过沟通协调得到化解，但有的家庭就会闹得鸡飞狗跳，这样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安定和谐，社会才能发展进步。如何避免父母过度“关爱”子女的现象？已经出现矛盾的家庭应如何化解？受访的两位专家一致提出，需要老年人、子女、社会服务三方面共同作为。

李婷说，老年人首先需要认识到自身与子女之间的界限，对子女的关心与牵挂不要过界，不要过度干涉成年子女的生活与工作。另一方面，老年人也要重新认识自身价值与意义，很好地规划退休生活，保持多元化的社交网络，培养新的爱好，增加社会参与。

“作为子女更要主动行动，有所作为。”计迎春提出，作为子女，要主动帮助父母适应这个数字化的时代，积极引导老人学习各种电子产品和App的使用方法。同时，要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兴趣点，比如创造条件让他们去旅游，参加社区活动让他们去开拓社交，报名老年大学等机构增加他们的兴趣爱好等。

“子女应该密切关注父母在生活转型期间的心理和生活状态，要给予父母足够的关心，有意识地帮助他们维持社会关系，培养新的爱好，来度过转型适应期。”李婷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计迎春和李婷均表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为老年人创造更多的保障、福利和便利，多渠道多方式地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她们还特别提出，很多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有意愿、有能力为社会继续创造价值，要充分发挥这部分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要科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增加就业创业、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等内容，让老年人“重新就业”，让老年群体在新时代找到参与社会的新方式。

“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大家谈”②

刘汶蓉

无论中西社会，幸福稳定的家庭对个人的身心健康，甚至财富积累都具有显著的保护效应。然而，近年来我国青年人的婚育率持续走低，2013~2020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5.8‰，人口出生率从13.0‰降至8.5‰，粗离婚率从2.6‰升至3.1‰，呈现去家庭化趋势。这一趋势与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构成张力，亟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作出调整，系统性地厘清工作—家庭关系，推动企业践行家庭友好社会责任。

家庭领域的劳动价值被挤压和低估是去家庭化的社会根源

从网络舆情看，“恋爱不如搞钱”的心态流行，宣告了爱情在经济理性计算中的落败。该心态背后揭示了青年人两方面的生存困境：一是普遍的经济安全感丧失；二是工作挣钱与恋爱在时间精力上的争夺，两者不可兼得。其背后无论是鼓吹“买买买”的消费主义，还是“鼓吹996是福报”的加班文化，都折射出当下经济社会环境对人的工具化，青年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特性被无限放大，而作为自然人的本真需求却被“共识性”地压抑。

工作和家庭分属于经济生产系统和社会再生产系统，都需要人的劳动投入。但前者属于有偿劳动，遵循竞争效率和商品价值逻辑，后者属于无偿劳动，遵循关系培养和情感回报逻辑。一个可持续社会的工作—家庭关系，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只有实现了家庭领域中的人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享有了充分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为生产体系提供持续动力，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良性互动。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再生产形成系统性的挤压，当大家都以职场成就，特别是挣钱多少为衡量人生成败唯一标准的时候，个体对社会再生产领域，如情感维系和家庭责任的投入就会高度压缩。与此同时，女性面临人生失败的境遇几乎是注定的。因为在性别分工文化下，只要她进入家庭，就必然承担更多的生育和家庭责任。在现有社会体制下，女性特别是那些缺乏家务支持资源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因结婚生子而丧失的职场机会和人生代价最大。

缺乏家庭友好的企业文化和制度设计阻碍性别平等政策执行

“家庭友好型”政策与“女性友好型”高度重合。回顾我国的政策实践可知，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统领下，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女性的人身、财产、政治参与、文化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权益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相配套的社会文化环境，女性的法律地位与现实地位始终存在差距。近些年来，一方面女性权益保护立法不断进步，家庭友好政策不断推出，女性维权意识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孕产、哺乳期间被解聘、降职、减薪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公众对职业女性遭遇“母职惩罚”的担忧有增无减。

2021年，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全国各省市陆续修改计生条例，延长生育假和增加育儿假。政策本意是保障职业女性在生育期间享有正当的经济权益，但却引发了社会广泛的热议，担忧过长的假期将抬高女性就业的“隐形门槛”，加剧职场的性别歧视。事实上，职场上对育龄女性的歧视不仅源于生育费用负担，因为生育保险基金的建立和支付已经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企业可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生育假所涉及的工作调整、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等，因为普遍缺乏工作机制预案，则可能影响生产效率和用工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家庭友好的企业文化和工作制度设计，没有尊重生育价值、尊重家庭劳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国家推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对于女性发展来说也就成了一把双刃剑。

推动企业践行家庭友好的社会责任须营造配套社会文化基础

长远看，企业建立家庭友好型工作制度，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也是自身发展的必须。在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和人才争夺战中，企业通过支持员工扮演好父母角色，平衡好工作—家庭角色，使员工安心高效地工作，可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吸引和留住人才。我国当前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型，昭示着企业践行家庭友好责任，打造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势在必行，而配套社会文化基础的进一步营造也势在必行。

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为企业践行家庭友好责任创造基础和条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践行社会责任离不开政府的监督、鼓励和福利托底。梳理北欧国家的经验可知，他们支持性别平等和家庭友好的政策，主要有三个核心支柱：一是普及的儿童津贴和托儿公共服务；二是慷慨的育儿假和父亲假期配额；三是较小的收入差距和弹性工作制，并不断进行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的探索。三者相辅相成，其中政府提供稳定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扮演基础角色。因此，我国在已经实现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对住房、幼托、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投入，通过减税或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践行家庭友好政策。

建构“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理念，让家庭友好文化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和循环。如前所述，当整个社会宣扬“生产高于再生产”的价值观，企业的目标不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缺乏从人的发展角度思考工作制度和场所设计的内生动力。我们期待一种基于员工、企业、政府和社会达成共识基础上的良性循环，而非因利益博弈产生各种非预期后果。只有共识，才能让社会对政府公共政策形成稳定的信任和预期；只有共识，才能让企业认真思考员工的生活需求和时间轨迹，设计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缩短办公室时间等，改变强制和僵化的工作机制；只有共识，才能让员工获得安全感并高效投入，从而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工作中收获幸福。

面对高度内卷的竞争轨道，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反思并树立适当的工作—家庭观。工作是联结个体与社会的纽带，我们不仅需要从中获取维持生活的金钱，还需要获得持久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幸福体验。因此，从精神和实践两个层面，创造性地发展个人生活理想，并积极地选择和投入工作和家庭生活，是个人避免被高度工具化的唯一道路，也是推动企业践行家庭责任和发展工作—家庭平衡文化的个体力量。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推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发展工作家庭平衡文化

民俗市趣

清明寒食 乡愁归处

善本

清明节为我国传统节日，在仲春与暮春之交，通常为4月4日至6日之中的一天，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自2008年起，清明节与端午节、中秋节一样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后，也成了一年中重要的“小长假”。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朝，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到后来民间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其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的融入有关。相传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死于火中的忠臣介子推而将其忌日命为寒食节，其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寒食节，也称“禁烟节”，即天下禁火、只吃冷食，其在后世发展中逐渐融合扫墓、踏青等习俗，且尤以扫墓为重。秦汉时代，祭扫坟墓的风气最盛。在唐代，不论士人还是平民，都将寒食节扫墓视为返本追宗的仪节，由于清明距寒食节很近，人们通常将扫墓延至清明。

宋元时期，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取代寒食节的地位，上坟扫墓等仪式也多在清明举行，就连寒食节原有的风俗活动如冷食、蹴鞠、荡秋千等，也都被清明节收归所有了。彼时诗人关于这几天的作品，也往往是寒食、清明并提，如韦应物有诗句说：“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白居易也有诗句说：“乌啼鹃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后来，朝廷规定，清明到来时，可以与寒食节一起放假。而后，寒食与清明渐渐合二为一，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物。

清明期间大多气氛消沉悲穆，故而人们常常借酒消愁，杜牧有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另外，由于寒食节与清明节同过，而寒食节期间只能吃凉食，而饮酒可以增加热量暖身，这也是清明饮酒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晋代陆翥《鄞中记》载：“寒食三日作醴酪。”说明当时有寒食节制作饮用甜酒浆的习俗。随着时代更替，在宋朝时，清明饮酒开始与郊游相

关。那时，每至清明，人们常常借扫墓之机，携带酒食春游，名曰踏青。据宋代周密《乾淳岁时记》记载，那时“南北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犹多……妇人淡妆素衣，提携儿女，酒肴肴至”，在开封城外郊区，更是“四野如市”，人们相聚在树下或园亭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在美酒佳肴的滋润下，尽情游玩，是颇富情趣的。

时至今日，虽然清明节在更大意义上已成为一个全民休假、娱乐的节日，但人们对祖先的缅怀和祭奠依旧。前两年腾讯视频出品的《客从何处来》，请当代名人共同追溯其祖上事迹，弘扬了传统道德文化，不失为多元化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创新。

清明节，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不论朝代更替、世事变迁，它始终扎根在人们心里，代表着人们最朴实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清明节是更多在外漂泊之人的一个心灵归宿，更代表着一种乡愁，始终谨记“祖上几何，我从何处来”。